

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研究专题

DOI:10.16320/j.cnki.sdqzzyxb.2017.05.022

主持人语

王玉香

社会工作价值观被认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它不仅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更对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方方面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社会工作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这导致目前我国在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方面在全国层面还没一个具有可操作化的统一规范,在实务中遇到涉及价值伦理方面的议题时就会出现不知如何应对和处理的局面。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规范的制定,同时也涉及到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方面的教育教学。制定符合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实际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一方面需要借鉴其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比较成熟国家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与我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与伦理的源头,找到二者的契合性。在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的教学中还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有鉴于此,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于2014年和2017年两次举办了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为支持这一主题的研究,本刊开设了关于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方面研究的专栏,登载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这一专栏的开设为有志于研究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方面议题的学者提供一个平台,推动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方面的深入研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快速发展。(王玉香,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爱还是仁爱: 伦理价值的文化审视与文化自觉

童敏

(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厦门 福建 361005)

摘要: 伦理价值一直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研究课题,但国内对该主题的研究却非常匮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步骤的加快,如何在与西方伦理价值的对话中挖掘和呈现中国文化精神资源已成为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瓶颈。通过分析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文化基础及其不足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以启蒙运动的普世化伦理价值为依据,相信抽象化的人的理性的假设,这必然导致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视角分别从人际和社会处境的横向维度以及文化历史的纵向维度修补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基础,把人的理性放回到日常生活中。儒家文化则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自我超越的维度,把人视为嵌于日常生活的伦理关系中并且有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能力,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实践体察不断“上达”的仁爱伦理价值,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修补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中的个人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割。本研究的结论将有利于中国社会工作者在本土的实践中发掘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提升文化自觉。

关键词: 伦理价值; 社会工作;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2-0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05(2017)05-0015-06

DOI:10.16320/j.cnki.sdqzzyxb.2017.05.003

收稿日期: 2017-07-10

作者简介: 童敏(1965-),男,浙江永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健康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和伦理价值以及中国文化与社会工作研究。

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务学科,一直把人的未来成长改变视为该学科的考察中心,不仅关注服务对象是什么,而且更为关注服务对象应该成为什么。伦理价值就被当作社会工作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它是带动服务对象和社会环境改变不可或缺的部分。^[1]有的学者直接把伦理价值视为社会工作最高层次、最核心的内容,认为脱离了伦理价值,社会工作就会沦为服务技术的奴隶,失去社会工作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对人的关怀的服务本质。^[2]然而,在实际的服务中,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更像“高高在上”的理念,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3],常常使社会工作者不是感受到现实的“冷酷”,就是觉得自己的“无力”,或者怀疑是否把自己的专业价值理念强加给了服务对象。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基础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做到对人的真正关怀?

尽管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有关它的基础的考察却大多地集中在文化来源和人性的哲学假设上,把它作为社会工作整个学科知识的基础。^[4]本文希望跳出这样的“客观”的实证主义观察视角,把伦理价值视为特定历史文化下的经验产物,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演变逻辑、存在的不足以及中国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的可能贡献,以期为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伦理价值的指引,呈现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提升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自觉。

二、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基础

为了保证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1960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第一次正式制定并且颁布了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作为规范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行为的标准。^[5]之后经过多次修订,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1996年再次公布了修订后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并得到国际社会工作界的广泛认可。中国社会工作者,也常常把它作为指导自己专业行为的标准。这一伦理准则认为,社会工作者既需要关注社会环境中个人的福祉,尊重个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又需要关注社会本身的福祉,挑战社会的不公正^①。^[6]显然,这一伦理准则把保障个人福祉和社会关怀作为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核心,当作社会工作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它适用于不同的服务场景和不同的服务

对象,甚至不同的社会工作者,而且强调这些伦理价值的要求反映的是个人和社会的本质诉求。这样,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就成为一种抽离特定场所和特定时间的普遍化要求,它背后所秉持的是本质主义的观点,即相信任何现象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固定的本质存在。^[7]

这种相信存在社会本质并且把伦理准则视为社会工作最高层次要求的观点,来源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它强调帮助现实生活中有困难的人,通过向他们施舍自己的钱财、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宗教虔诚(piety),展现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同情心不是出于寻求他人回报的要求,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的教义,尽自己的生活责任。^[8]在这样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推动下,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成员参与了社会组织慈善运动(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vement)和睦邻友好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催生了专业社会工作,他们把自己作为社区贫困人群的“道德示范”,指导这些贫困人群克服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习惯,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重新找回宗教的信心和博爱的精神。^[9]

实际上,这种博爱精神的背后是对个人潜在能力的信心和个人自由的推崇,它根植于西方社会十七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把个人的人性从中世纪的神性中解放出来,倡导自由、理性、法制和个人尊严。^[10]这些启蒙运动的伦理价值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它把个人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抽离出来,变成普遍意义上的人,代表所有的个体。这样,启蒙运动的伦理价值就具有了普世性,即相信人有共同的本质。^[11]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把个人的自由理解成个人尊严和社会法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对独立的:前者代表个人层面,关注个人尊严的实现,后者代表社会层面,强调社会公正的法制保障。显然,正是依据启蒙运动的逻辑框架,作为现代社会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才建立起自己的专业伦理准则。

当然,启蒙运动伦理价值中最核心的是对个人理性的推崇,相信人拥有理性的能力,能够分析和理解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运行的规律,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必然导致盲目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的掠夺。^[1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样的理性被视为可以脱离特定场景“高高在上”的理性,失去了理性产生的环境条件和场景限制。这样,不是夸大伦理价值的要

求,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就是强调现实的“冷酷”,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更为致命的困惑是,这种以博爱精神为基础的伦理价值给社会工作者画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让社会工作者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只要符合伦理价值的,就是对的,这促使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不是矮化他人,就是矮化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专业反思能力。^[13]

三、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伦理价值批判

上述主张普世化的伦理价值的观点首先受到来自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周围他人而存在的,人的任何感受,包括秉持的价值理念,都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与参与交往的任何一方都有关系,是一起建构的过程。^[14]正是通过社会建构这个概念,社会建构主义把个人的理性与互动的场景连接起来,不再把个人的理性视为可以脱离具体环境的。这样,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价值也就具有了两个重要特性:场景性和动态性,即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价值是不同的,它随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处于同一个场景,也会因不同的互动时间而有所不同;而且个人和社会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相互分割、彼此独立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两个层面紧密相连,一起处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15]在此基础上,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人际责任(relational responsibility)的理念,以修补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所导致的个人中心主义的困境,认为纯粹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自由只有通过人际责任才能实现,而且借助人际责任,个人与社会的分割就能自然消除。^[16]

此外,社会建构主义还特别关注语言的作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常需要借助语言,通过语言人们才能把生活的意义赋予具体的互动过程中。^[17]但是,一旦运用语言理解互动的意义时,就很容易局限在自己的解释逻辑中,忽视其他可能的意义解释。这样,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敏感性(value sensitivity)就变得尤为重要,他(她)需要相信,人无法做到客观中立,在倡导一种服务方式时,就可能忽视其方式,因此,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对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保持警觉,注意其他的可能。^[18]显然,在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框架下,文化自觉成为伦理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女性主义的讨论集中在性别经验和文化中的性别压迫上,但是她们沿用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基

本逻辑,把个人与人际关系中的他人联系起来。他们提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这一重要概念,认为个人的经验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19]与社会建构主义不同的是,女性主义关注人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强调互动双方常常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反映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的社会不平等。因此,女性主义提倡“个人即政治”的口号,要求把个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考察联系起来,认为个人是无法脱离社会结构来理解自己的人际状况的。^[20]基于这样的考察,女性主义总结提炼出人际关系中的自主性(relational autonomy)概念,希望找到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能够维持个人意志论与宿命论之间的平衡,既不过分关注个人的自主性和自决能力,也不过分强调环境的制度条件和结构限制。

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扎根于现实环境中的伦理价值不同于以博爱精神为基础的普世化的伦理价值,是一种人际关爱(relational care),即把人际关系的维持和建设作为整个生活的中心,它不是突出个人的福祉,而是倡导一种与个人伦理价值完全不同的新的伦理价值标准,女性主义称之为关爱的伦理(the ethics of care)。^[21]

四、文化视角的伦理价值考察

与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所采取的社会批判视角不同,文化视角考察的重点不是从人际和社会处境的横向维度来理解伦理价值的基础,而是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分析伦理价值演变的内在逻辑。尽管文化视角的考察也会分析伦理价值在人际和社会处境中的表现,但是它把这种横向维度的考察放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中理解的,认为这种横向维度的表现只是纵向维度在某一时间阶段的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随之而变化。因此,从文化视角在分析伦理价值时,就需要了解这种伦理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22]当然,不同的理论对这种内在演变逻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从反种族歧视入手,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仅仅是种族这一方面的歧视,还包括性别、阶级、年龄等,是整个压迫的环境,对这种压迫环境的自觉和反抗就构成了演变的核心^[23];有的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开始探索,认为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意识自觉是其最核心的焦点^[24]。这样,对他人的理解就需要返回到自身,理解与自己文化处境不同的他人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联,这就是文化视角所强调的“反身性”^[25]。反身性意味着,个

人的生活是镶嵌在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的,他(她)的理性能力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文化历史场景的连接和自觉的能力,并不是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所说的超脱生活之上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反思和批判。^[26]

为了加强个人与文化历史场景的连接,文化视角还引入了社会位置的概念,认为反身性的关键是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进行审视,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透视周围的他人和环境,并由此理解和梳理影响社会位置的特定文化历史场景的内在关联。^[27]显然,只有通过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理解,人们才能把日常生活中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信息整合起来,并且根据社会位置的要求进行平衡和协调,对周围环境做积极有效的回应。^[28]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了解的越深入,也就越能够深化自己生活经验的理解能力,使人的理性具有了特定文化历史场景中的整合能力。^[29]

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审视还有另一项重要功能,能够把自己过去的经验、现在的观察和未来的预期连接起来,在时间维度将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确认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现实的定位,是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30]这样,人的理性也就具有了穿越时间的能力,是站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场景中对过去经验的回顾和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对这种特定文化历史场景了解的越深入,也就越能够透过文化历史的现实表现看到其中演变的内在逻辑。这种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场景中探究文化历史演变规律的逻辑不同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普世化的个人理性解释,也不同于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对人际关怀的普遍推崇,它相信人的理性是扎根于自身的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扎根的越深,也就看的越远,这被文化视角称为场景性(contextualization)和在地性(localization)的知识。^[31]

从文化视角来看,承认和接纳社会差异(social differences)是社会工作的首要伦理价值。^[32]因为无论社会工作者遭遇什么样的服务对象,他(她)都需要把对方视为不同于自己的个体,不仅有着与自己不同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有着与自己不一样的社会位置。如果社会工作者强调与对方一起抗争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就会陷入“虚假的平等陷阱(false equality traps)”中,看不到自己与服务对象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将社会公平公正原则过分抽象化和浪漫化。^[33]实际上,只有当社会工作者坚持这种社会差异的伦理价值原则时,才能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

生活中,尊重服务对象自己的发展要求和个人的基本权利,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34]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视角所说的社会差异是与个人特定社会位置的审视相关联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差异的确认帮助个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否则,通过社会差异的强调只会有意或者无意地美化生活中的关爱伦理,让社会工作者成为了“和事佬”。^[35]

基于文化视角的考察,美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在2001年对美国社会工作伦理准则进行修补,增添了有关文化胜任力(cultural competence)等十项要求,并且把文化自觉作为文化胜任力的核心。^[36]

五、儒家精神资源的伦理价值审视

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影响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的重要精神资源。它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世化的逻辑存在根本不同:它把伦理价值的核心放在了家庭,而且是家庭的伦理关系中,其中父子之间的孝的关系被认为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仁爱学说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显然,在儒家文化的逻辑框架中,个人的自觉意识发生在人际关联中的,涉及人际互动中的双方或者多方,是人际关联场景中对自身状况的警觉。尽管它看上去像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所推崇的人际关爱的逻辑,但是两者有明显不同之处,儒家文化关注的是人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而且还意味着血缘和亲情关联在个人身份中的重要作用。^[37]可以说,中国人的理性自觉是一种伦理关联中的自觉,家庭伦理关系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儒家文化认为,日常的生活实践就是生命实践的场域,每个人在其中都需要将自己的仁爱之心呈现出来,“力行近乎仁”(《中庸·第十二章》)除了“力行”之外,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如果再加上“知耻”,配上“勇”就可以理解怎么“修身”,及时觉察和调整自己的生活状况(《中庸·第十二章》)。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就是体验“一以贯之”的“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显然,在儒家文化看来,自我与他人不是对立的关系,他人也不是自我的“他者”,而是拥有共同的生命

“仁爱”体验的同行者,一起感悟生命的真正内涵,这是一种人际间性的仁爱观。^[38]不过,儒家文化对这种人际间性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这种关联与人的创造性直接联系起来,视为人的独一无二特性的体现。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既表现为总是嵌于某时某地的原初联系中,又表现为总可以从此地出发通过日常生活的学习过程转化自己和周围他人^[39],学会被儒家文化称之为仁爱核心内涵的“爱人”^[40]。这样,儒家文化在日常生活的生命实践中延伸出了新的自我超越的维度。

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儒家文化也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并没有把人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或者相反,要求把人放回到日常生活中,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而是把人放在天地之间,观察人与天之间的关联。^[41]这样,天人关系成了儒家文化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一方面天赋予以意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使人与天命之道“不可须臾离也”,只能“畏天命”和“知天命”^[42];另一方面人拥有了解道的能力和主动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颜渊》),不是“为仁”完全“由己”(《论语·述而》)。因此,对于儒家文化来说,人的生命实践就不仅仅是理解自己的社会位置以及自己与周围他人的交往状况,还是参与和体察生生不息的天的“中和”之道,从自己偏狭的“小我”中跳出来,体察不断“上达”的仁爱伦理价值,到达“至诚”,使人和物都能尽其性,帮助天地化育生命(《中庸·第二十二章》)。

显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仁爱为中心的生命实践,是一种借助不断自身“内省”的文化自觉过程超越自身的局限,转化自己所拥有的生命的责任和意义。这样,生活的局限就成了“内外相合”生命转化的基础和条件,引导人们走向“天人合一”的仁爱伦理价值的理想境界。^[43]这种生命境界的逻辑可以修补西方伦理价值中的个人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割和对立。^[44]

六、总结

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关注伦理价值的要求,一直把它作为社会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甚至将其视为社会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种建立在博爱精神基础上注重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二元划分的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依据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的抽象化和普世化的解释,忽视了人的理

性与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常常导致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就已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它们把人的理性与人际互动的实际生活场景连接起来,强调人的理性只有在特定的人际生活场景中才能发挥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倡导一种人际关爱的伦理,开始关注人的文化自觉能力。文化视角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审视更为深入,认为人的理性与人所处的特定社会位置直接相关,不仅关乎人在特定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也与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有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文化历史生活场景中对未来生活的规划能力,并把这种能力推崇社会差异,作为社会工作的首要伦理价值。

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普世化伦理价值不同,它把人的理性视为伦理关系中的自我觉察能力,强调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生命实践,通过日常生活中生命实践的“仁爱”关联的参与和体验,不断超越自己的局限,转化自己生命的潜在能力,体察不断“上达”的生生不息的仁爱伦理价值,走向“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2008年又对社会工作伦理准则进行重新修订,在1996年版本的基础上补充了“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和“尊重多元(diversity)”的要求,开始把文化的元素放入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中。

参考文献:

- [1] [13] [31] [32] [34] Clifford, D. & B. Burke. Anti-oppressive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9, 57, 160, 29, 34.
- [2] [8] Specht, H. & M. E. Courtney.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170, 63.
- [3] Weick, A., C. Rapp, W. P. Sullivan, & W. Kisthardt.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 Social Work, 1989, (4): 350-354.
- [4] Bartlett, H. M. Working definition of practice [J]. Social Work, 1958, (2): 5-8.
- [5] Reamer, F. G.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s [J]. Social Work, 1998, (6): 488-500.
- [6]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Code of ethics [R]. Washington, DC: Author, 1996: 5-6.
- [7] Modood, T. Introduction. In T. Modood and P. Werbner (eds.),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new Europe [C]. London: Zed Books, 1997: 1-25.
- [9] Howe, 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4.
- [10] 【美】杜维明, 黄万盛.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J]. 求是学刊, 2005, (4): 28-34.
- [11] 【美】杜维明, 衣俊卿.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

- [J]. 求是学刊, 2009, (1): 5-18.
- [12] [16] McMamee, S., & K. J. Gergen. Relational responsibility: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ialogu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6-10, 18.
- [14] [15] [17] [18] Gergen, K. J.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47, 55, 48, 170.
- [19] Miehl, D. Relational theory and social work. In Francis J. Turner (5th ed.),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01-412.
- [20] Segal, L. Is the future female? [M]. London: Virago, 1987: 23.
- [21] Porter, 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th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9: 5.
- [22] Lee, J. A. B.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Francis J. Turner (4 ed.).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218-249.
- [23] Dominelli, L.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context. In R. Adams, L. Dominelli, & M. Payne (2nd eds.), Social work: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C]. New York: Palgrave, 2002: 3-19.
- [24] Sisneros, J., C. Stakeman, M. C. Joyner, & C. L. Schmitz. Critical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M]. Chicago: Lyceum Books Inc, 2008: 20.
- [25] [26] [33] Dominelli, L. 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108, 77, 66.
- [27] Ixer, G. There's no such as reflec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9, (4): 513-527.
- [28] Bleakley, A. From reflective practice to holistic reflexivity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9, (3): 315-330.
- [29] Smith, E. Teaching critical reflection [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1, (2): 211-223.
- [30] Fook, J. Critical Reflection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J. Fook, & F. Gardner (Eds.), Critical Reflection in Context: Applications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12.
- [35] McLaughlin, J. Femin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alogues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85.
- [36]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 standards for cultural competenc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R]. Washington, DC: Author, 2001: 1.
- [37] 【美】杜维明. 家庭、国家与世界: 全球伦理的现代儒学探索 [J]. 张友云,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9, (5): 2-10.
- [38] [40] [42] [43] [44] 蒙培元. 蒙培元讲孔子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7, 62, 49, 37, 36.
- [39] 【美】杜维明. 超越启蒙心态 [J]. 雷洪德, 张珉, 译. 国外社会科学, 2001, (2): 14-21.
- [41] 【美】杜维明, 范曾. 天与人: 关于儒学走向世界前瞻的对话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5-12.

(责任编辑: 孙书平)

Universal Love or Benevolence: A Study on Values and Ethics in Social Work from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TONG M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i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Values and ethics are one of the major research themes for science of social work's establishment, bu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m in Mainland China, and it becomes imperative for social workers to draw on the rich cultural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with western values and ethics,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work is increasing.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bases of the universal love-based western values and ethics and its limits. The findings are: a) The universal love-based values and ethics derive from the insights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and have the assumption that human rationality is universally valued; b) Social constructionist, feminist and multiculturalism contribute to the idea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rsonal rationality and its environments and emphasize the sense of self-awareness in one's environment; and c) the Confucianism is the source of thoughts for self-transcendence in daily life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 in the processes of becoming oneness and wholeness. The results are benefit for the Chinese social workers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competence in the field work.

Key words: ethics; social Work; Confucianism